

智慧公安视角下的现代警务流程再造

——智慧公安系列研究之三

■ 上海市警察协会课题组

摘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技革命与管理革命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性。当警务活动科技含量提升到一定高度，就会在警务发展中发挥出“催化剂”作用，推动形成新的警务形态和警务增长方式。本文将这一过程定义为现代警务流程再造，并从流程再造的本质出发，全面阐述了智慧公安背景下，警务工作如何迈过部门利益这道坎，通过改变贯穿始终的业务链以及在这根链上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实现“破部门之壁、建流程之轴”。

关键词 现代警务流程 情指行一体化 智慧公安

流程再造理论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企业管理领域的业务流程再造，强调打破基于部门职能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业务流程为中心设计管理流程，追求整体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重点关注成本、质量、服务、绩效等要素，并将之贯穿于整个业务流程。随着该流程再造在不少企业取得巨大成功，该理论也被引入到政府部门，也在公安机关有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实践。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同机构改革配套的相关政策制度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机构设置、力量资源配置，加强机构人员职能整合、业务工作融合、机制流程衔接。要把大

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这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直接用“警务流程再造”这个词，但这些重要讲话精神，为推动现代警务流程再造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现代警务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

现代警务流程再造是指公安机关在动态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借助警务活动科技含量提升的技术优势，在现行警务体制和职责任务框架内，对处理警务活动的流程和方法等作革命性重构，通过信息流、业务流、管

课题组联系人：袁志航，上海市警察协会副会长

理流的有机融合和警务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衔接，实现全维信息感知、实时智能处理、整体协调控制的一体化运作的过程。现代警务流程再造有三个关键词：“破壁”“借力”“服务”，分别对应了企业流程再造和政府流程再造的相关特征，以此作为推进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破壁”，就是破除“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重塑以流程为导向的警务运行机制。现代警务流程再造具有鲜明的“破传统性”，主要特征是注重整体性和“去部门化”，秉持流程先决思维，将流程作为警务活动的切入点，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当前，公安机关部门林立、分工很细，部门间的横向协同部分失灵，乃至许多常态工作也要通过设跨部门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协调，纵然各部門“各司其职”做得再好，也难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跨域、跨界复杂问题。因此，“业务工作融合、机制流程衔接”，用流程把各部门警务活动贯穿起来显得尤为必要。当流程把业务都融合在一起时，部门之间也就自然成为“命运共同体”，协同问题当然不在话下。

“借力”，就是借助科技的力量，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化流程管理，使警务活动更加精准和高效。科技至少从两个方面增加现代警务流程再造的成功率。第一，技术的效率更高。有了科技的支撑，才能实施以感知为起点的警务流程，使警务活动愈加跨前，把风险隐患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二，技术不会说谎、不讲情面。现代警务流程再造打破传统，部分工作由机器来派活儿、来考核，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现代警务流程再造“得罪人”的顾虑。

“服务”，就是对内服务基层、服务实战、

服务民警，对外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现代警务流程再造强调上级服务下级、领导服务民警、警种服务属地，让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讲效率。坚持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导向，强化属地主战、一线综合执法、警种管建管援功能，做强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综合保障向基层倾斜，并切实为基层减负。无论是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还是民警辅警，对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一网通办”“不出家门办成事”已不再是奢望，基层单位可以根据需求“定制”部门警种的管建管援“产品”，民警则享受了“客户”的礼遇，智能移动警务终端、单警装备都把民警体验度纳入考量依据，不仅强调好用、管用，更强调民警受用、爱用。

二、属地主战和警种管建管援

“属地主战、警种管建管援”是上海公安机关在现代警务流程再造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十分明晰地界定了属地和警种在警务运作中的职责分工，相比以往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属地主战，可以理解为在科学分工、明晰属地与警种“权”“责”基础上，使属地公安机关专注于主营辖区的打、防、管、服、建、教等工作，破解以往属地面临的指挥多头、职能交叉、勤务杂乱、警力空耗、忙闲不均等问题。明确属地主战，是对属地公安机关“综合性战斗实体”的理性回归，同时意味着与属地主战职责相适应，警力、装备等相关警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改变“干活在下面、工具在上面”的现状。警种管建管援，明确了警种服务基层的义务，既体现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职业要求，有利于强化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和专业支撑，

挤压了警种对基层的指导关系变相为领导关系的空间，让警种可以集中精力加强专业建设，有利于业务攻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对上海市公安局而言，分局、派出所都是属地，对分局来说，派出所是属地。做强派出所，是落实属地主战责任的重中之重。派出所工作的价值追求，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这也构成了派出所属地主战的主要内容。第一，坚持以防为主的工作定位。派出所作为确保一方平安的综合性战斗实体，防范是派出所的主责，打击任务主要是“除小恶、治小乱、破小案”。第二，完善守土有责的勤务机制。淡化警种意识、强化警察意识，实行一线综合执法和交通管理属地化，改变原先“一警一岗一分工”的局面，除执法办案人员外，人人都是户籍警、巡逻警、交通警，都要就近接处“110”警情。在打破固有分工的情况下，切实强化综合指挥室的统筹调度。第三，助推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派出所是诸多社会治理主体中，平台最大、力量最强、机制最全、管理最严的基层组织，必须发挥好平安建设组织者和基层社会治理主力军作用。第四，发扬服务人民的好传统。在公安机关中，派出所接触群众最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直接窗口。要通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综合窗口，让人民群众感到办事更方便、服务更温馨，彻底消除对派出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印象。

属地主战的真正落地，关键是放权、减负和综合保障上的适度倾斜，是在理顺公安机关条块之间的事权关系、层级关系、结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有效制度供给和措施集成，使属地公安机关尤其是派出所承担责任、有权力、也有相应的能力来确保一方平安。放权，是赋予属地更大的自主开展

工作的空间。减负，是减少部门警种对属地不必要的束缚。综合保障适度倾斜，是实实在在帮助属地解决具体困难，确保属地更好履行主战的职责。在放权、减负和综合保障上的适当倾斜三个方面中，放权是核心。具体地说，就是重新确定指挥权、勤务调动权和考核权的归属。

指挥权必须高度统一。指挥是一门艺术，尤其是重大警情处置，指挥的专业性很强，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难以估计的后果。因此指挥权必须高度集中，只隶属各级指挥中心，以避免多头指挥、甚至“瞎指挥”。合成作战是现代指挥体系的重要特征，除了交通指挥纳入整个公安指挥体系，情报（大数据）、特警、舆情处置等部门都在指挥中心设常驻席位，以便于统一指挥、同步处置。同时，适应属地主战和扁平化指挥的要求，依据警情的不同实行分级指挥，分局设指挥中心，派出所设综合指挥室。指挥权允许依据警情变化发生变更，当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发现现场情况比较复杂、超出属地处置能力范围时，必须及时向分局乃至市局指挥中心报告，由分局或市局指挥中心直接指挥。

勤务调度权以属地为主。一是指挥权高度统一下的分级指挥，只适用于省、地、区（县）、派出所这4级，不包括部门警种。二是勤务调度权属于各级指挥中心，常态勤务模式下以属地公安机关为主，除非对完成任务有直接影响，上级指挥中心和部门警种对属地公安机关的勤务安排一般不宜干预。加强勤务模式下由公安部、省级或地市级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统一确定勤务等级，必要时可以安排具体勤务，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三是警种对特定勤务有特殊要求时，必须通过同级指挥中心下达勤务安排。四是科学把握指挥权、勤务调度权与一般工作协调的区别，

警种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对属地公安机关提出指导建议，这不视为越权指挥。

考核权应当相对集中。大家普遍认为“考核是指挥棒”，说明考核确实关乎警务活动的目标、过程和结果，说它是指挥的“衍生品”并不为过。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要考核权依然掌握在林林总总的部门手上，多头指挥的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解决指挥权归属的同时，对考核权也必须严格加以规范。总的来说，考核权应当相对集中，考核内容也不宜过多过细。业务工作与队伍建设一并考核是最理想的，以体现“两手抓”“两手硬”。上海公安机关在确立警务流程再造原则时，明确警种“管建管援不管考”，全局包括业务、队伍在内的综合考核由政治部一家负责，各警种可以就条线考核提出建议，但必须放到市局的大篮子里，先是充分听取基层意见，然后把所有业务部门都请来，相互PK，经过反复论证，由上海市公安局党委最终拍板，最大限度兼顾了业务均衡，切实为基层减负。

警种管建管援，要求专业警种聚焦属地主战，坚持服务至上，围绕专业建设、战略支援两大功能定位，从制度、业务、手段、智能化四个维度的专业建设和警力、装备、技术、智力四个维度的战略支援入手，全面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强化对属地分局和派出所的保障支援，切实提高基层公安机关战斗力。

专业建设是警种最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标志着一个警种业务工作的整体发展水平。专业建设主要包括制度建设、业务建设、手段建设和智能化建设。从顺应时代要求看，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规范化问题。警种管建的一大任务，就是建立健全完整的、适用于全警种的制度、

预案、标准体系。第二，现代化问题。专业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紧跟时代潮流，努力使本业务领域的专业水准、技术手段和警务装备，能够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优化，为警种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增长点。第三，集约化问题。集约化的实质，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创造尽可能高的效益。在当今条件下，对警种内部实行集约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范围也越来越广。第四，协同化问题。合作共赢、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任何警种都离不开属地和其他警种的支持配合。围绕警种与属地、警种与其他警种、警种与其他相关方面的协同配合，以及警种的跨省乃至跨境合作，都是警种专业化建设的新课题。

战略支援是警种作为专业力量，对属地公安机关在专业领域给与支撑和援助的一种义务。它的支援对象主要是属地——分局警种和派出所的相关业务。战略支援是通称，包含了战略支援和战术支持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解决共性问题，后者以解决个性、具体问题为主。战略支援包括警力支援、装备支援、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援。警力支援指的是依责按需出动专业执法力量开展递进执法、梯次支援，也就是说派出所完成不了的任务分局相关警种给与警力支援，分局相关警种仍无法承担的市局相关警种给与警力支援。智力支援从战略上讲是开展专业培训、培育专业型人才；从战术上讲就是因需提供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方面的服务，帮助属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三、一线综合执法

目前国内大部分地方公安机关还没有实行一线综合执法，甚至在不同行政部门试点

联勤联动的情况下，内部的交警、巡警执法仍处于各自为政状况，这彰显了进行流程再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线综合执法，是属地主战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这里说的“一线”，主要是指派出所。从上海情况看，派出所侦破了全市半数以上的刑事案件、查处了90%左右的治安案件，承接了全局2/3的政务服务事项，是权重最大、贡献度最高的“属地”；“执法”，包括了执法、管理、服务等派出所绝大部分的基础和业务工作。派出所是公安机关中业务最广泛、工作最繁杂的基层单位，解决好派出所综合执法问题，是现代警务流程再造举足轻重的一环。

现在推行一线综合执法，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熟。首先，实行综合执法是大势所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进一步整合行政执法队伍，继续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政府职能部门间尚需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在公安机关警种间推行综合执法更是题中之意。其次，有应急响应机制和现代科技手段作保证。与20年前上海交巡警综合执法相比，现在公安指挥体系更加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日臻完善。派出所专门设综合指挥室，强化点对点扁平化指挥，执法民警随身配备移动警务终端，综合执法中遇到困难，可在第一时间获得响应和支援。多款执法智能应用模型适用于不同执法种类和场景，易学易用，便于掌握，使一线民警从单一执法变成综合执法成为可能。

流程再造背景下的一线综合执法是真正意义上的“化学融合”。第一，打破了警种界限，建设新型全能警察。派出所民警只分

一线综合执法民警（全科医生）和专业执法民警（专科医生）两大类，不再分交警、巡警、社区警，人口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管理等工作全面融合，只要是综合执法民警，人人都要巡逻、做群众工作和“110”处警。第二，全面整合了管理要素，赋予警务责任区全新功能。现在的责任区警力虽然比过去增加，但不再以“一居一警、一村一警”方式配置，而以责任区为最小作战单元，在责任区内统筹安排勤务，变“分田到户”为“联产承包”。责任区的“责任”范围也相应增加，涵盖了从社区到单位、街面所有公安基础工作和综合执法工作，打、防、管、建一应俱全，责任区警务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功能综合性战斗实体。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责任区的划分要与政府主导建立的社会治理“网格”相对应，最大限度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第三，持续融入科技元素，再造了基层警务新流程。坚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并举，推动线上业务与线下业务融合，从警情处置到政务服务，警务流程、运行模式均发生一系列“质”的变化。

一线综合执法中的“综合”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从不同执法主体角度讲，是实行了交通管理属地化，将原来由交警部门承担的部分任务移交给派出所，相应地，按照“人随事转”原则下沉警力，对派出所来说是增加了交通管理的职能，需要对传统派出所执法与新增交通管理执法进行综合。另一个维度指的是责任区警务队和民警个体的综合执法，即不仅对交通管理实行综合执法，还针对原来派出所执法中内部分工过细的部分，拿出来一并综合。对于派出所来说，原则上我国《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14项法定职责中涉及各类一线执法任务，除了受特定管辖、程序、装备、手段所限，无法

落实到属地的任务以外，都可以由一线综合民警承担。每个派出所辖区划分若干平行结构的警务责任区，按需配置由一定执法民警组成的最小作战单元，对区域内的“人、物、房、点、路、网”六大要素实行全覆盖管理。一线综合执法实行“全科+专科”递进执法模式，一般情况下由综合执法民警先期处置、专业民警按需增援，仍无法完成处置的由上级警种支援或承接。除社区、单位（楼宇）、街面等外部勤务外，内部勤务也实行综合执法，派出所不再分户籍、治安、交通、出入境窗口，统一归并为综合窗口。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将户籍、交通、出入境等服务事项纳入政府办事窗口，实现更大范围的综合服务。

四、情指行一体化

情指行一体化指的是“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是根据“情报主导警务”理论发展而来的，可以理解为情报主导警务在我国的升级版。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是情报主导警务还是在此基础上的情指行一体化，情报在警务工作中的基础地位都不容置疑。我国公安机关在强调情报主导警务的同时，更加注重整体性、协调性、操作性，率先提出了情指行一体化的概念。

警务活动科技含量提升和现代警务流程再造是实现情指行一体化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现代科技做支撑，没有“打破鸡蛋做蛋糕”，不可能真正做到情报共享，即便有，也是延时的、低效的共享。当今社会已全面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越多、要素越全，情报研判就越精准，大量布设的感知“神经元”可全时空获取各类治安要素信息，而强大的算力，则保证了在最短时间内将零星、杂乱、

低密度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指挥人员可通过可视化、扁平化、智能化指挥体系，向一线行动部门实施统一、高效、动态化指挥，必要时调动专业力量进行梯次支援。行动部门则借助警用无人机、移动警务终端等技术装备，随时掌握现场情况、接受上级指令和反馈处置结果，需要时还可请求支援。

从广义上讲，情指行一体化涵盖公安机关大部分警务活动，包括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刑事侦查、治安秩序乃至行政管理等，虽然没有达到警务战略那样的高度，但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警务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工作重点、警力投向、勤务方式等。从狭义上讲，情指行一体化主要局限在战役或战术层面，通常是指在一次专项行动组织、或者一起案事件处置的过程中，情报、指挥、行动的有序、协同、高效，更加突出“快速”“灵敏”“精准”和“应变”能力强的特征。相对而言，广义的情指行一体化则更加注重打防结合、攻守兼备，特别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和一定时间跨度内对警务工作作出的决策部署，往往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突出了主动型警务“以防为主”的特点。我们通常讲的“情报主导警务”“警力跟着警情走”，主要是指广义的情指行一体化。上海公安机关在设计和推行情指行一体化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流程再造原理，坚持科技引领、流程先决，在全量数据汇聚、毫秒计算响应、智能模型研发的强大支撑下，打通跨越部门的诸多环节，强化感知、研判、指挥、处置四个环节的闭合运作，首创了“感知泛在、研判多维、指挥扁平、处置高效”精准警务模式。

感知泛在：促使情指行一体化运作的新“催化剂”来自感知端，泛在的感知网络是情报、指挥、行动部门共同的信息源。过去指挥部门感知社会治安态势主要依靠“110”

警情这个传统“晴雨表”，情报部门的信息源主要是案事件信息和有限的人力情报，总体看都没有跳出被动感知、被动研判的框架。随着智慧公安建设的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感知风险隐患的渠道得到很大拓展，感知泛在正成为实现“预防为主”主动型警务的重要基础。现在公安机关的“感知源”主要有：第一，报警类信息，包括“110”警情，以及群众通过其他方式举报、报案获知的案事件信息。第二，触发类信息，指由智能监控、智能门禁、智能安检等“神经元”和反电诈、追逃等各类风险洞察系统自动发现、推送的信息。全域、全量、多维、即时的感知“神经元”，为公安指挥、情报部门和属地派出所汇聚数据、提升情报研判的主动性打下厚实的基础。第三，衍生类信息，包括侦查破案“扩大战果”、情报研判“由此及彼”等获知的信息，行政管理和群众工作中获知的有价值信息等。特别是将警务重心向基层延伸，明确社区工作重点就是采集数据、应用数据，要求一线民警都建“警民微信群”，与遍布的感知“神经元”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基层感知体系。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叠加、人与“机器”结合，使警务工作更加“耳聪目明”。

研判多维：真正给情报研判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是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应用。2014年上海公安机关以全面实现数据业务化为目标，以实战应用为导向，创立“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标志着情报研判正式进入大数据时代。几经迭代深化，情报研判技术和研判水平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在“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数据警察”专业警种，成立了警务中台，通过实时人机互动、在线“客服”方式，将后台“公安大脑”数据转化为各类实战所需、直接可用的

信息结果，输出给“前台”执法民警。目前，研判多维正成为情报研判工作的新特征，其多维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判资源更加丰富。借助感知泛在和社区、单位（楼宇）、街面警务，上海公安机关按照全量汇聚数据的要求，全面掌握“人、物、房、点、路、网”六大管理要素的基础和动态信息，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六大管理要素大大拓宽了情报研判的渠道，丰富了研判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六大管理要素的“管理”与研判资源的“研判”是互为过程、互为结果的，研判服务于管理，管理又在更高层面便利了研判，在不断循环往复中，推动两者工作再上新台阶。第二，研判手段更加先进。传统情报研判主要靠“人脑”，即知识、经验、想象力等，现代情报研判则更加强调人机一体、专业研判、深度研判。技术不仅能提升研判效率，而且可以在成熟领域代替人的研判。公安机关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研发建立满足不同实战场景的数据分析模型，通过对汇聚的全域全量数据进行重组、碰撞，挖掘深层次逻辑，输出有价值的“成品”“半成品”，再结合情报人员的叠加研判，最终形成实战情报。第三，研判主体更加多元。如果说研判资源丰富、研判手段先进主要得益于科技元素的话，研判主体多元则主要是警务流程再造的产物。随着警务流程再造的深化，特别是一线综合执法的推行，数据“壁垒”被打破，代之以数据资源的分级分类管理，除少量核心数据外，大部分数据对全警开放，情报研判也成为各项警务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研判主体多元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指挥扁平：指挥是一个对效率和准确性要求极高的环节。尤其是应急处突，战机稍纵即逝，容不得半点迟疑，如果对案事件的

性质、范围、走势等判断失误，造成错误指挥，后果更不堪设想。实行扁平化指挥，有利于拉近指挥端与处置端的距离，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增加对现场情况的了解和处置工作的介入，确保高效、精准处置。第一，完善有利于扁平化指挥的指挥体系。在派出所设综合指挥室，变“两级指挥、三级处警”为“三级指挥”，表面看是增加了一个层级，实际恰恰是实施扁平化指挥的需要，让指挥更接地气。第二，遇重大警情市局指挥中心能有效实施“点对点”指挥。“点对点”，意味着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指挥更直接、更高效。现在有了可视化终端，加上指挥人员可以直接调用的实时视频图像，实现“点对点”指挥有了可靠保证。第三，用“数字孪生”技术提升指挥的“现场感”。“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在同步呈现现场环境、处置情形，与处置警情所需的预案信息等一并投放到指挥大厅大屏幕上，既发挥了远程指挥的整体优势，又增加了远程指挥的“现场感”。第四，减少非警务信息对警情处置的“消耗”。警情处置也是一种资源，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就意味着效率降低。对外，将经过甄别的非警务信息，在前端即下达分局指挥中心之前就实行分流，直接推送“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相关责任主体响应承接，使其不再进入警务流程。对内，主要是做好警情的分类和分级。重新划分警情类别，科学界定紧急与非紧急类警情，分别明确到场时限和处置规范，探索制定各类警情递进推送的对象范围、信息通道和衔接流程。对自身或通过守望相助能够处理的警情，倡导群众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开展“自助自救”“互助互救”，处理不了的及时处警，实施“公助公救”。同时，探索警情智能化分类，利用AI技术让机器读

懂警情，自动分类。科学界定警情升级触发条件和情景模式，通过设置关键字、敏感词等升级标签，实现系统智能提示与人工干预指挥的有机结合。

处置高效：处置是警务流程的末端环节，直接关系到处置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提升处置效率，警务流程再造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多点布警，缩小处警“半径”。“到达现场时间”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警务效率的重要指标，很多国家在设计警察机构布“点”方案时，参数之一就是巡逻半径，以确保巡逻警察能在核定时间内到达现场。增加警力布点密度，是确保快速处警的有效保证。在这方面，上海公安机关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中心城区重要区域（部位）建立“1、3、5分钟”处置机制，由特警处置小分队驻点备勤，重点防范类似“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案”等极端案事件。另一件是明确责任区综合民警的巡逻、处警职能，通过流程再造达到布点效果。第二，综合用警，发挥1>1的功效。通过一线综合执法，相对提高了行政管理和警情处置的覆盖面。第三，强化梯次增援，确保处置质量。处置高效是对处置工作最具特征性要求的概括，其内核包含了精准，以及理性、文明、平和、规范的要求，这些都要通过加强对民警队伍的教育、管理和培训来实现。同时，建立专业执法梯次增援机制，既确保了综合民警“轻装上阵”、不因办案羁绊等影响社区、街面勤务，又弥补了综合民警专业能力不强的短板，确保了处置质量。在高效处置方面，科技的辅助工具很多，其中最典型、应用最广的是智能移动警务终端，它不仅有可视化的通讯功能，更有执法指引、场景应用等辅助执法功能，“一机在手，执法不愁”，深受一线民警欢迎。

责任编辑 张树彦